

民粹主義與2020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

廖崇翰**

《本文摘要》

民粹主義是一種深藏在民主社會中的極端現象，也是許多不同概念所構成的一種侷限性的意識形態，它會影響人民對政治菁英的態度，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本文以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為基礎，分析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與補選的投票情形。民粹主義在兩次不同時期的投票中，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並且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是否會因為他們的人口背景以及政治態度的不同而影響。

本文以兩筆資料進行罷免與補選的投票分析，一是蔡佳泓主持，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另一份是陳陸輝主持的「台灣選舉民主化調查」，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

* 本文使用的資料有二，「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資料來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內部調查資料，感謝時任中心主任蔡佳泓教授的資料提供；另一部分係採自《2020年至202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1/4)：高雄市長補選案電訪》(TEDS2020M_BE-T) (MOST 109-2740-H-004-004-SS4)。「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20M_BE-T為針對2020高雄市長補選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陳陸輝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TEDS網頁：<http://teds.nccu.edu.tw>。作者除了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外，本文初稿曾在2020年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的「基層民主與高雄市長選舉研究工作坊」，感謝當時評論人吳重禮教授對文章的評論與建議，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的修改指正，本文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E-mail: liaos153@gmail.com。

行的「高雄市長補選案電訪」。研究發現，在罷免時期，民粹主義會受到選民的年齡與學歷的影響；在補選時期，民粹主義傾向會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學歷及職業的影響。另外，高雄市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不會影響他們的罷免投票抉擇，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是選民投下罷免票的主要原因；在補選時，民粹主義傾向愈低的選民會投給陳其邁，但民粹主義不會影響選民投票給李眉蓁。韓國瑜雖然在補選時有幫忙李眉蓁造勢，但並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關鍵詞：民粹主義、罷免投票、補選投票、韓流現象

壹、前言

2018年的地方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以53.87%的得票率，超過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的44.80%，贏得高雄市長的寶座，中斷了民進黨在高雄市長達20年的治理。因為高雄市選舉過程中的氛圍以及勝選的鋒芒，讓韓國瑜頓時成爲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其忠實的支持者，「韓粉」，成爲了韓國瑜強而有力的依靠，讓國民黨在2019年的總統黨內初選中，將韓國瑜納入黨內初選的民調，並在初選民調中，以44.8%的支持度奪下黨內第一。

由於韓國瑜上任市長半年後，隨即表態參與2020總統大選，帶職參選以及任內的施政表現與競選承諾都被提出討論。此時台灣基進黨員陳冠榮、公民團體WeCare高雄發起人尹立、公民割草行動發言人李侑潔以及時任台灣基進新聞輿情部副主任張博洋等四人，合作推動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活動。並在2019年12月25日，由陳冠榮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程序提起罷免案，提出剛當選市長後就隨即去選總統，違背責任政治、市政滿意度六都最低、荒廢市政、放任韓流與紅媒介入台灣民主、以及性別歧視言論等五大原因要求罷免韓國瑜市長。

罷免投票於2020年6月6日舉行，成功罷免韓國瑜，使其成爲首位被罷免的直轄市長。在韓國瑜市長解職後，高雄市也隨即在中選會及地方選委會等決議，訂於同年8月15日舉行高雄市長補選，此次補選也是民進黨在中斷20年高雄市治理權之後，有機會重新取得市長的機會。參與高雄市長補選的候選人中，主要由國民黨提名的高雄市議員李眉蓁，民進黨的陳其邁，民衆黨的高市議員吳益政等三位角逐，最後由上次競選失利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以70.03%的得票率在補選中勝出，成爲補選後的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大起大落，以及韓粉的勢力消長，在歷經兩年之後也回歸平淡。綜觀兩年來的韓國瑜及韓粉的社會現象，學者們試圖去解釋相關情形，及分析該現象對往後選舉的影響，而我們從許多地方可以發現其行爲表現與民粹主義的特徵接近。

據Canovan (1984)、Müller (2016)、Mudde與Kaltwasser (2017)三位學者對民粹主義的深刻定義及討論，他們認爲民粹主義所定義的人民一詞，可以在社

會結構中的垂直面分爲菁英與人民，在水平面則可以分爲我群和他群。意指民粹主義架構是上層菁英與基層人民的互動情形，並且當團體內部形成一種共識時，將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此時民粹主義的現象就會產生。

我們回顧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的選舉語言，在其「莫忘世上苦人多」，以及批評在民機進黨執政20年之後的高雄市，變得「又老又醜」，形塑他與基層的高雄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對抗長期在高雄市執政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也造成了「韓流」效應。韓粉不僅擁護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也成爲護送他挑戰總統大位的靠山。韓粉的特徵在於他們對其他團體的排他性以及無條件支持韓國瑜的形象令人相當爭議，他們有著較爲感性的訴求以及與其他團體明顯區隔的方式，在各種公開場合上，用比較激烈的情緒表達對韓國瑜無條件的支持，與民粹主義中定義的反菁英、我群他群以及感性訴求等有類似的特徵。由於韓粉是在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時期產生，高雄市在韓國瑜競選總統失利之後，迎來的是罷免韓國瑜以及補選高雄市長的選舉，然而韓粉與韓國瑜的關係相當微妙，韓國瑜自己參選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大選的時候，可以輕易號召帶動支持者，但是從總統大選結束了之後，韓國瑜的言詞行動也隨之較爲低調，此時的韓粉所產生的民粹主義效應，是否還會繼續影響著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的投票？韓國瑜是否可以再度動員韓粉影響兩次的選舉？也是本文爲何想透過民粹主義來分析影響兩次投票結果的原因。

貳、民粹主義與選舉

本節將說明民粹主義的核心概念、台灣的民粹主義發展以及其與韓流現象的關係，最後針對民粹主義與選舉的關係進行回顧。

一、民粹主義的意義

民粹主義(populism)的概念最早是由Ionescu與Gellner (1969)所提出，他們認爲民粹主義是指在二次大戰後，新興國家走向共產主義時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現象，政治人物會基於這個現象進一步利用各種方式來獲得，人民如信徒般的

來支持他們的行為，並且針對國家的制度進行各種不同的反制與作為。而這些反制與作為可以從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該國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情形，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所以兩位學者評價民粹主義是至今仍是朦朧且模稜兩可的概念，因為民粹主義會根據不同國情的歷史軌跡以及社會和經濟的表現，以不同的名稱在各國內部運作，它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特徵，讓所有看似複雜的事情變的平等公平的情形。

Canovan (1984, 315)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談民粹主義，她認為民粹主義的根源來自於字義上對人民(people)的解釋。人民一詞在英語上呈現三種不同的意思，人民可以作為國家(nation)、弱勢(underdogs)以及一般人(everymen)三種。人民作為國家猶如政治人物說我們的同胞，或是在這個地方的人們，通常指的都是在這個國家生活的人民或是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們，呈現出一個整體不分你我的概念；人民作為弱勢是將人分為不同階級，如菁英或是白領階級及藍領階級等差異，在不同群體內具有相同的特質的人，並享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是意識形態，每一群體之間的排他性很強，群體之間也會有對抗的情況出現；人民作為一般人(everymen)，是從生理的角度來看，只要是具有人類特徵的就是人民，這也衍伸出不同的民粹主義現象，例如川普指的「讓我們將美國變的再度偉大」此處所指的美國即是指美國人民；政治領導人提到我們人民時，有時是為了弱勢民眾發聲，並非指全體人民的意思；雖然在多元社會下的所有人，沒有區分你我的情形，但是在民粹主義中，則是盡可能突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Canovan (1984, 314-322)同時說明了每個人因為不同的人口背景，對社會現實會有不同的感受，也因此才會塑造出不同人群彼此之間排他性的概念，不僅在人的左翼、右翼的意識形態認同，也包括其中菁英與普羅大眾的區別，這都可以體現在教育程度、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差異，以及族群和性別在不同議題上的認同，也因此民粹主義者可以從不同的社會議題及社會現況來提出不同人或不同團體的差異性，並導致民粹主義的出現，所以民粹主義的概念中，也包含了人口背景與民粹主義的影響。

然而，Müller (2016)認為除了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之外，民粹主義同時也是非自由的民主對非民主自由的回應。他認為民粹主義看似是對民主的威脅，

但同時也潛藏著政治正確的意涵，當政治菁英的作為離人民的需求越來越遠時，民粹主義的產生就變成回應政治正當性的方式，這也說明了不同意識形態及生活背景有所差異的人們，展現出民粹主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Müller (2016)認為在政治的世界中，人被分為人民與菁英兩種，民粹主義的意義即是人民與菁英的對抗，菁英在民粹主義的定義中是腐敗或是道德低下團體，帶領人民去批評有權有勢者以及政府的人被稱為為民粹主義者，他們宣稱自己代表人民，反對菁英也反對多元主義，所以民粹主義在定義人民的角色之後，也進一步強調人民如何與菁英對抗，民粹主義者會帶領人民反抗菁英與體制。

Mudde與Kaltwasser (2017)也從人民的意義闡述民粹主義的概念，但是概念上有些微差異。Mudde與Kaltwasser (2017)認為人民是主權、平民與國家，這與Canovan (1984)主張人民是國家、弱勢與一般人概念上接近，但Canovan (1984)是由上而下的方式定義人民，是從統治者看被統治者的方式來定義，但是到了Mudde與Kaltwasser (2017)時，他定義人民的角色就是由下而上的方式來說明，人民不僅是絕對政治權力的來源，也是民主制度的制定者，所以當國家的權力不再是以人民為主時，民粹主義者就可以代表全體人民要求將政府治理權還給人民；人民即是一般平民，不分你我都是整個社會及國家的一分子，他們代表的是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人民可以視為國家，基於族群或是公民的概念之下，被視為一個國家社群(Mudde and Kaltwasser 2017, 11)，這也是現代民主國家界定人民角色的主流。除了人民的定義不同之外，Mudde與Kaltwasser (2017)也將民粹主義的輪廓描述得更精確，他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侷限(thin-centered)的意識形態，這當中不僅是人民的角色，還必須包括了菁英的角色，以及人民的全意志(*general will*)。當菁英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會使人民形成一股對抗菁英的心態，因為人民沒有菁英的影響力，所以透過加入團體的方式形成一股全意志，藉由全意志所產生的結論才是直接代表人民的利益(Mudde and Kaltwasser 2017, 16; Taggart 2000)。

Mudde (2017)闡述民粹主義的核心價值必定包含人民、菁英與全意志三個概念之外，他也認為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的極端發展。他同意Ionescu與Gellner (1969)所提出的民粹主義是存在於不同文化及不同制度底下的情況，因為不同地區所發展出來的民粹主義有不同途徑的解釋，民粹主義可以視為是民主

政治的特殊形式，將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正面的力量，使人民在民主體制中得以發展；也可以將其視為是解放的力量，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的激烈與極端走向，這樣的情況會製造衝突，創造排他性的組織來改變社會現狀，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源頭，將人民的地位視為是最高的概念，在民粹主義的驅使下，民粹主義者會透過許多方式聚集群眾意見，進而影響政府與對抗菁英。

從Canovan (1984)、Müller (2016)至Mudde與Kaltwasser (2017)對於民粹主義的定義及說明，可看出過去學者對於民粹主義的討論主要是強調在人民的意義，以及人民與菁英互動關係的範疇，雖然過去文獻中並沒有將個人的人口背景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對民粹主義的影響來做討論，但學者們卻指出民粹主義在定義人民時，是因為人們彼此之間的種族、文化、認同以及生活背景差異，在面對不同社會議題上會有不同的感受或是權利義務受到影響，因而會劃分成不同團體來爭取自身的權利外，也同時造成民粹主義的出現。

民粹主義者代表人民對抗菁英的權力運作，它體現在人民反制菁英的行為，但不會影響個人的主要價值觀，因此在當政治領導人以及政治菁英無法滿足人民在社會的需求時，民粹主義將會出現反制現況，這也是本文想要透過民粹主義中人民對於「反菁英」的感受來分析此次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的原因。除此之外，本文也會同時討論選民的政治態度、人口背景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以了解台灣的民粹主義現象，是否與選民背景及價值觀的差異有關。我們將進一步回顧台灣民粹主義的發展，以及韓流現象與民粹主義的關係。

二、台灣的民粹主義與韓流現象

民粹主義根基於人民如何在民主社會的意義，人民可以是被統治者，也可以是賦予菁英統治權的人，無論是哪一種角色，人民與菁英的互動情況皆會有可能產生民粹主義的現象，所以如同台灣這樣民主制度完善的國家而言，是否也有民粹主義的情況出現？關於這方面的討論，過去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討論台灣的民粹主義發展。

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最早提及台灣社會的民粹主義起源，他們認為台灣在李登輝時代由一黨獨大的黨國體制轉型至現今民主政治的過程中，經歷

了權力分配結構與政治體制的重新安排，並且也重新界定了身分認同的國族 (identity) 建構傾向，對外積極加入各項國際組織，對內強化台灣意識的方式，讓台灣人民逐漸對台灣有生命共同體的認同，也讓台灣社會產生了「民粹威權主義」的色彩。簡而言之，台灣在威權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的過程中，因為重新建構人民的自我認同以及強化人民這個概念的定義，導致台灣出現具有民主制度以及民主化的特徵，但是人民依舊在此時服從威權的領導，這也是兩位學者提到當時的台灣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上，雖然以分權制衡、代議制度及多元社會的方式發展，實際上卻是介於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過渡期間，新的政府體制以民主之名，卻能夠行威權之實，能夠動員人民讓威權以民主為號召，成為當時台灣政治的主流特色（王振寰與錢永祥 1995, 31）。

張佑宗（2009）以2006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資料探討台灣民粹主義的情形，他認為民粹主義本質就具有價值判斷的情況，並且民粹政治現象是程度問題而非有無的問題（張佑宗 2009, 89），所以民主國家無論民主程度多深化，我們勢必可以在其中發現民粹主義的現象。在2006年1月至3月的全台調查中，發現台灣民衆有六成以上的選民是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僅有二成的選民是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其中有趣的是不同背景的台灣民衆，會影響他們的民粹式民主傾向。在控制其他人口變數的情況下，他發現造成選民具有不同傾向的原因是其教育程度的影響，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自由民主傾向的比例愈高；教育程度愈低，民粹式民主、開明專制及傳統威權取向的比例愈高。其次選民其他的的人口背景也會影響他們的民粹式民主的感受，性別、年齡、省籍、統獨立場及政黨認同皆會影響選民的民粹式民主。由此可知，台灣選民的人口背景，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他們的民粹式民主傾向，也因此我們在分析台灣的民粹主義情況時，也需考慮選民的人口背景差異（張佑宗 2009, 101-103）。

黃昱琄（2014, 52）針對台灣民粹主義的轉變進行探討，他認為過去台灣社會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過程，形成了民粹威權主義的現象，執政者透過民意取得正當性，藉由威權主義的形式來貫徹自己的意志，而台灣現在的民粹主義是選舉民粹主義，指的是政治人物在競選時，透過民粹主義的操作，產生對自己有利的情勢以取得勝選。

何振盛（2020）從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特徵差異著手，並進一步對照韓流現象是否與民粹主義相同。首先，韓國瑜反映了基層民衆的對經濟的需求，並且行事風格具有草根性特質，創造了不少選舉語言，充滿了感性的訴求，他的庶民語言風格、藍領階層裝扮，並且能夠直接動員支持者的能力等都與民粹主義的特徵相同，因此他認為韓流可以稱為台灣新一波的民粹主義現象。除此之外，胡正光與江素慧（2020）認為韓國瑜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比競選市長的時候，民粹主義的表現更為明顯，並且他們也認為儘管韓國瑜不是很民粹的政治人物，但是韓粉確實是有相當強烈的民粹主義表現，韓國瑜只能說是韓粉這個團體在政治上出口，韓粉的民粹主義態度比韓國瑜更值得關注。最後，Batto (2021)對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時所提出的許多民粹主義式的詞語進行分析，他發現韓國瑜帶有民粹主義特徵的語言，確實吸引了選民投票給他，並且有很多都並非是國民黨的支持者，這也顯示出選舉式民粹主義至今在台灣的影響仍舊存在，韓粉作為近年來最顯著的民粹主義現象，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其影響的層面。

三、民粹主義與投票參與

民粹主義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學者認為這與政治人物、政黨及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有關。在《美國選民》一書中，Campbell等(1960, 192-194)提出意識形態會影響個人的行為表現，在不同的社會現象中，例如失業等情況下，人民的意識形態會驅使他們轉而支持能給予他們改變現狀的政黨，並在往後的選舉上改變他們原本支持的對象。民粹主義在根本上屬於選民的心理層面要素，當選民覺得自己與政治菁英的作為及想法不一致時，會激起選民「反菁英」的心理感受，選民就會在投票的時候選擇將票投給站在自己這一方的政黨或是候選人，因此偏向與選民站在一起的候選人及政黨會在選舉時透過不同議題的操作，來產生民粹主義的現象。

Oliver與Rahn (2016)針對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情況分析民粹主義與該次選舉的關係，他們發現川普的選舉口號時常抨擊政治菁英，也有諸多譴責性的語言，他相當喜歡用我們及他們在表達自己的選舉的立場，更重視的是區分我群及他群的方式解釋政策需求的問題，所以川普不僅被視為是民粹主義者，也

同時讓該年美國總統選舉受到民粹主義態度的影響，這也顯示出川普利用批評政治菁英的方式，激起選民「反菁英」的情緒，達到有利於自己的民粹主義現象。

同樣的Bakker、Rooduijn與Schumacher (2016)在美國、荷蘭以及德國的資料中發現，選民的人格特質會影響他們認同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訊息，並會影響他們投票給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Akkerman、Zaslove與Spruyt (2017)以荷蘭大選為例，發現選民意識形態在極端偏左和極端偏右的時候，有較高民粹主義傾向的選民，在經濟議題、移民政策及威權等議題上，將會影響其投票給特定政黨，因此對選民而言，民粹主義的傾向是會影響他們的投票參與及投票抉擇。

Norris與Inglehart (2019)則以文化反彈來形容民粹主義的現象。從川普當選及英國脫歐等事件都可以發現民粹主義的跡象，因為這些現象的出現是由於國內的經濟不平等，選民對政治菁英治理國家的失望，使民粹主義者以此為號召，各政黨也同樣開始展開類似的訴求，因此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會出現的原因不僅是民意的需求，也是政黨的生存策略以及憲政體制下的選舉制度所造成的，在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下和反菁英的情緒出現時，選民會投票給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或是以民粹主義作為號召的候選人都是對既有文化或價值的反彈。

Leininger與Meijers (2021)檢視歐洲國家從1970年代開始，共有31個國家以及315次的選舉中，發現當東歐國家的國會是由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勝選時，該次的選舉投票率都相對較高，但是西歐國家並沒有類似情形，所以他們認為在東歐國家裡，民粹主義傾向的政黨會驅使選民有較高的意願去投票。Nowakowski (2021)以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在2002至2016期間的8次跨區調查資料分析，他發現歐洲國家的投票現象中，選民具有民粹主義傾向，並導致他們去投票的情形是一種既存的現象。van Leeuwen等(2021)同樣分析2012與2017的荷蘭國家選舉，因為荷蘭兩大主要政黨自由黨(PVV)與社會黨(SP)分別是意識形態偏右與偏左的政黨，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的社會問題以及政策內容上，都會讓選民容易有民粹主義的傾向，他們從過往每個地區的福利政策、移民問題以及工作機會不平等的情況發現，不同的社會問題都會驅使居住

在不同地區的選民，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義傾向，進而影響他們投票給自己支持的政黨，所以在荷蘭的選舉中，地理環境及行政區劃也影響了人民與菁英對立的情況。

回顧過去研究，民粹主義與投票參與的實證研究不多，但在不同地區及不同文化的選舉中，都可以看到民粹主義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而且多數民粹主義現象的產生是來自於選民對政治菁英的失望所導致。回顧高雄市長罷免以及補選的情形，韓國瑜回到高雄市府後，面對罷免案的表現不如他在競選總統時期的高調，但是韓粉卻是積極的阻止罷免活動，雖然罷免案依舊通過，但是韓粉的渲染力依舊相當強。韓國瑜在罷免投票結果出爐後，發表個人意見時也表示，認為罷免投票是場不公不義的選舉，執政黨透過媒體不斷抹黑自己以及罷韓國家隊等言論，也重新激起韓粉的情緒。這些訴諸民眾情緒的言論，儼然是民粹主義領導人激起選民的民粹主義情緒的方式。

由於韓國瑜對韓粉的言論，使得在補選時期，國民黨以及李眉秦試圖想複製韓粉的影響力來爭取高雄市長的職位。李眉秦最後一天造勢晚會時，韓國瑜號召韓粉到場的情況來看，韓國瑜與韓粉對於市長補選的影響力依舊存在，雖然最後在得票數懸殊的情況下輸給了陳其邁，但競選期間國民黨確實相當依賴韓國瑜的韓粉在高雄市打下的基礎，所以我們好奇韓國瑜及韓粉創造出來的民粹主義現象，是否對這兩次選舉有影響？

根據民粹主義的定義，人民會因為反菁英的態度而推翻政治菁英，韓國瑜在成為高雄市長後，並沒有達到當初他以庶民身分挑戰民進黨的執政團隊的批判言論來回應高雄市民，並且還在任期未滿的情況下進一步往上挑戰總統大位，也造成非忠誠的支持者，難以繼續信任這位市長，讓曾經相信他的支持者失望之外，也因為他的施政表現不如預期，此時的韓國瑜已經不是庶民的代表，而是上位之後，離人民越來越遠的政治菁英，所以在高雄市長的罷免中，我們預期罷免韓國瑜的選民會因為反菁英的民粹主義態度較高去投下罷免同意票，另外因為韓國瑜的政黨認同偏向泛藍的關係，有鑑於西方國家發現意識形態與政黨支持可能會影響選民的民粹主義，所以我們也預期政黨認同偏向泛綠的選民也會傾向去罷免韓國瑜，統獨立場因為是地方選舉以及韓國瑜曾經為農民到大陸去賣農產品，所以我們認為統獨立場應不會影響罷免投票。

另外在補選投票上，透過民粹主義的定義及理論預期，民眾反菁英的情緒已經體現在韓國瑜身上，所以投票給陳其邁的選民將不會有反菁英情緒，所以民粹主義愈低的選民，會將票投給陳其邁，反之會把票投給李眉蓁，因為國民黨在競選期間也試圖把韓國瑜的支持者找回來，加上韓國瑜定義罷韓是不公不義的選舉，所以韓粉在具有反過去民進黨政治菁英的感受上，會繼續支持國民黨的李眉蓁。針對民粹主義是否對兩次選舉皆有影響？我們在下一段將說明本文的研究架構與分析方式。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來源

本節將說明透過前一節的文獻回顧後，本文如何測量民粹主義，並說明研究設計、變數操作與分析方式。

一、民粹主義的測量

前述我們了解民粹主義的核心價值是人民的意義，但是民粹主義的測量，最初卻是以民眾對於公共議題態度的分布開始發展。Axelrod (1967, 52-53)蒐集美國民眾對多個公共政策的感受，藉由多個公共議題的測量來分析美國民眾的自由主義感受，意外的發現將題目以反向的意思來測量時，可以顯示出美國民眾的民粹主義態度，這也奠定了民粹主義的資料蒐集會以集群(cluster)的方式執行，在此階段的民粹主義測量雖然以公共政策為主，但因為人民對政策的感受可以認為是人民和政治菁英之間需求和供給的關係，政治菁英的政策及作為是否與人民的需求貼近，是民粹主義現象產生的關鍵要素，所以學者藉此分析民眾的民粹主義態度。

Hawkins、Riding與Mudde (2012)對民粹主義的測量，最初的構想是了解一般人民與腐敗菁英的概念測量，經過分析後發現民粹主義的測量也會有部分概念的重疊，他們從民粹主義、多元主義以及竊取民主(stealth democracy)三個方向的測量發現，民粹主義的題組與多元主義及竊取民主的題組有較高的相關性。基於這樣的結果，Akkerman、Mudde與Zasllove (2014)及Hawkins、Riding

與Mudde (2012)也在其研究基礎上，特別強調民粹主義題組主要測量的是核心價值為人民主權、對菁英的反制、人民與菁英之間的好與壞。這與Mudde、Müller等人把民粹主義定義為人民與菁英之間的互動情形的情形一樣。所以Akkerman、Mudde與Zaslove (2014)透過民粹主義的核心概念也進而發展出測量民粹主義的方式。

相較於Hawkins、Riding與Mudde (2012)及Akkerman、Mudde與Zaslove (2014)對民粹主義的測量方式，Schulz等(2018)使用的測量概念就不同於上述的操作方式。前述的測量方法主要是以民粹主義單一題組進行測量，但是Schulz等(2018)將民粹主義的測量方式分為三大題組，以反菁英、主權及我群他群的三個面向進行測量，Schulz等(2018)的瑞士研究中提到，民粹主義不僅止於強調菁英與人民的關係，還包括主權以及我群他群的劃分問題，因此他們將民粹主義的測量以反菁英、主權以及我群他群的團體劃分概念等三面向進行測量，然後再合併成為民粹主義，與過去學者直接以民粹主義題組進行測量不同，對Schulz等(2018)而言，民粹主義不是單一題組測量，而是以三種概念的題組彙整後才成為民粹主義。

從Axelrod (1967)至Schulz等(2018)對於民粹主義的測量有不同的差異，因為民粹主義會因為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以不同形式存在於各國社會當中。相對於歐美多元文化及種族複雜的背景之下，台灣的國情及社會環境相對簡單，張佑宗（2009）在測量台灣的民粹式民主時，以選民對垂直課責及水平課責的感受來分析，垂直課責是測量受訪者三種民主政體的感受；水平課責是制衡行政機關的方式，最後整理出大部分的選民較傾向垂直課責，而水平課責較低，因而建構出民粹式民主的特徵。

但從課責的角度較難以解釋韓國瑜及韓粉在選舉時期的群眾行為，韓國瑜與庶民站在一起，對抗長期執政高雄市的民進黨，這樣的特徵可以視為反菁英的行動。並且高雄市長的罷免及補選，主權及我群他群團體的議題，也較難展現出來，雖然韓國瑜曾經訪問過中聯辦，但目的是推銷在地農產品，主權爭議的討論並沒有持續太久；同時韓粉雖然是一個團體，但卻不是極為排他性的團體，雖然對其他團體有較強的攻擊性，但並不阻礙有相同理念的人一起支持韓國瑜，在西方國家對於團體之間劃分的定義，是以人民彼此之間生活習慣、種

族以及文化背景差異較大的情形。韓粉與其他團體之間的差異在於支持不同候選人的差別與行動，並不是在種族、生活習慣以及文化背景差異極大的團體。

本文最大的研究限制，是無法從西方國家對於民粹主義的多面向測量來進行分析，然而我們從前述的研究回顧，以及張佑宗（2009）對台灣的民粹主義研究也得知，民粹主義不僅要考量各國國情的文化差異，也要了解不同社會現象所產生的動機，所以本文雖然無法從三個面向測量民粹主義，但是基於韓粉行為與韓流現象背後的運作及外在表現，我們認為民粹主義中「反菁英」的概念可以分析韓粉和韓流所產生的民粹主義現象，主權、我群它群的現象並沒有在這兩次選舉有所展現，因此本文採用Schulz等(2018)對「反菁英」題組的部分題目測量台灣民粹主義的表現來進行分析，這是韓粉一直以來在公開場合的行為表現，也是韓國瑜以此作為韓粉的精神理念，有關不同學者的民粹主義測量題目可詳見附錄三。

二、研究架構與變數操作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有兩筆，有關罷免投票的資料來源是蔡佳泓主持，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2020年6月10日至6月14日，訪問高雄選民對於高雄市長罷免投票一案的情形所執行的電話訪問，共完成1,106份成功樣本；第二筆資料是高雄市長補選投票，於2021年由陳陸輝所主持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科技部計畫，訪問時間為2020年8月19日至8月23日，訪問高雄選民對於高雄市長補選的情形所進行的電話訪問，共有1,160位受訪者接受訪問。我們藉由兩筆資料比較不同時期的高雄選民在罷免投票與補選投票的感受，並檢視民粹主義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由於張佑宗（2009）的研究，發現選民的人口背景與民粹式民主有關，另外也考慮到韓流現象以及韓粉一開始是從高雄展開，然後才進一步擴大到對全台灣選民的影響，並且在我們回顧韓流現象與韓粉時，也發現其符合民粹主義的特徵。然而發起韓國瑜罷免投票主要原因是來自於韓國瑜當市長時的施政不佳，並且補選的時候，韓國瑜最後也有號召韓粉去為李眉蓁造勢及催票，所以我們除了需要分析高雄市選民的人口背景與其民粹主義的關係外，也需要說

明罷免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態度與韓國瑜施政表現，以及補選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與韓國瑜喜好程度，有助於我們了解罷免與補選時期韓粉、民粹主義的關係，之後再進一步說明高雄選民的人口背景與民粹主義的關係以及其影響投票的情形。因此本文的研究分析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分析在罷免及補選時期，高雄選民的人口背景和民粹主義的關係，二是分析兩次投票中，民粹主義與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在變數操作上，依變數首先民粹主義的測量是以三道題目來詢問受訪者的感受，在問卷的題組測量上，我們會透過正面與反面得問句來蒐集選民的觀感，然後將其問卷答案轉換為同一方向後再進行合併。所以在合併民粹主義題組時，我們將最後一題的測量與前兩題測量反轉後進行合併，再將三題加總成3至12範圍的變數，並將該變數轉換成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的連續變數，以此做為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轉換為0至1的變數區間，可以幫助我們在分析時，能夠了解在其他變數維持平均數的情況下，民粹主義由最小到最大，對依變數的影響情形，因此我們將民粹主義的變數轉換為0至1範圍的連續變數。所以數值愈高代表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愈高，也就是選民的反菁英傾向較高，數值愈低代表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愈低，也就是選民反菁英的傾向較低。由於民粹主義為連續變數，所以在分析上我們使用多元回歸來分析選民人口背景與民粹主義的關係。

第二部分的分析是以選民的民粹主義是否會影響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的情形，此部份的依變數為選民的投票抉擇。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第90條的規定「罷免案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有效罷免票數中，不同意票數多於同意票數或同意票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者，均為否決。」（法務部 2021）若選民不踴躍投票的話，即使最後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同意票數未達四分之一時，也不會罷免成功，並且韓國瑜在當時也曾表態請支持者罷免投票當日不要去投票，目的即是為了四分之一選舉人數的通過門檻。

所以基於罷免規則中不投票視為無法通過門檻的因素，本文在罷免投票時的投票抉擇，將不同意罷免及沒有去投票者編碼為同一類，依變數及分為同意罷免、不同意與沒有去投票兩類別。在依變數為二分類的情况下，我們以以二

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來分析選民在罷免投票時的抉擇。

在補選投票時，參選人有陳其邁、李眉蓁與吳益政三位，雖然民衆黨推出吳益政參選，但由於該次選舉主要集中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吳益政得票率僅為4.06%，選民的投票基本上是回到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對決，加上投票率為41.83%，多數選民是沒有參與補選投票的情況，因此我們在補選投票的分析上，將依變數編碼為投票給國民黨的李眉蓁、投票給民進黨的陳其邁以及沒有去投票三類，由於依變數為類別變數三分類，且沒有排序的情形，所以補選投票的分析我們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進行分析。

本文的自變數與控制變數選擇上，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為主要自變數，在投票參與的分析中，我們也控制了選民的人口背景與其他政治態度的變項。首先人口背景的部分我們以選民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別與父親省籍來分析，另外我們也進一步控制選民的政黨認同、統獨立場、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等變數一併納入罷免投票的分析。年齡我們以20歲為一世代的方式分為20-39歲、40-59歲以及60歲以上，性別分為男性、女性，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學歷為基礎，以下為國中以下學歷，以上為大專以上學歷等三類別，職業類別的部份，因為韓國瑜個人有軍公教背景，並且選舉時以站在庶民的藍領階級與弱勢作為號召，也在自己的政見中以自身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的經歷，強調如何把高雄的農產品外銷，也在當選市長後積極推銷高雄水果等，所以職業別我們將其分為軍公教、職員、勞工、農林漁牧以及無正式工作收入者等，此處所指的無正式工作收入主要是學生以及家管兩者，從而分析不同職業背景在此兩次選舉的投票情形。

政黨認同分為泛藍、泛綠、中立三類，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台灣民衆黨在本文的研究中歸類為泛綠，主因在於政黨認同的歸類以政黨的意識形態進行分類，台灣民衆黨過去主要吸引泛綠選民較多，意識形態雖然有別於民進黨但並未向國民黨等泛藍政黨靠攏，因此將台灣民衆黨歸類為泛綠；統獨立場分為偏統一、偏獨立以及維持現狀三類；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分為台灣人、兩者都是以及中國人三類；父親省籍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以及大陸各省市人三類。

當時罷免投票連署時，主要是針對韓國瑜的施政表現與選前承諾不如預期為理由，因此我們在罷免投票的分析將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納入選民的罷免投

票分析。而在補選投票中，因為韓國瑜最後被罷免成功，且在罷免成功後的言論也使韓粉心情相當激動，國民黨在補選時期也是希望能將韓粉的氣勢在高雄能夠延續下去，但是陳其邁、李眉蓁與吳益政三位都是地方公職人員，對地方的政治也經營許久，投票時可能受到候選人自身特質的影響較大，因此在補選的分析中，我們將選民對陳其邁、李眉蓁以及韓國瑜的候選人評價納入控制變數來分析，以方便我們了解在眾多條件中，民粹主義的傾向對選民在補選時的抉擇情形。

選民罷免投票及補選投票的分析架構圖如圖1所示。圖1左側為主要自變數及控制變數，包括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人口背景與政治態度等變項，右側依變數為選民的投票抉擇，包含高雄選民的罷免投票選擇，以及補選投票時的投票抉擇。罷免投票分析我們納入韓國瑜市長的施政滿意度作為自變數，補選投票我們另外納入候選人評價，以及韓國瑜的喜好度作為自變數進行分析。以上為本文的研究架構、資料來源以及變數操作方式，是否高雄的選民面對罷免韓國瑜市長以及補選新市長時會受到他們的民粹主義傾向而影響，相關分析將在下一節說明。

肆、資料分析

本節將分析高雄市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以及民粹主義和人口背景的關係，並且在控制選民的人口背景及政治態度等變數下，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與罷免和補選兩次投票的影響。在民粹主義題組的測量與合併之後，高雄市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如表1所示。在兩次調查中，可以看出高雄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差異不大。在罷免投票時期，高雄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平均值為0.51，標準差為0.20，補選時期的民粹主義傾向平均值為0.58，標準差為0.23，所以高雄市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可能在補選時期有被激起，民粹主義傾向極有可能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抉擇。有了這樣初步的觀察，我們緊接著分析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與其人口背景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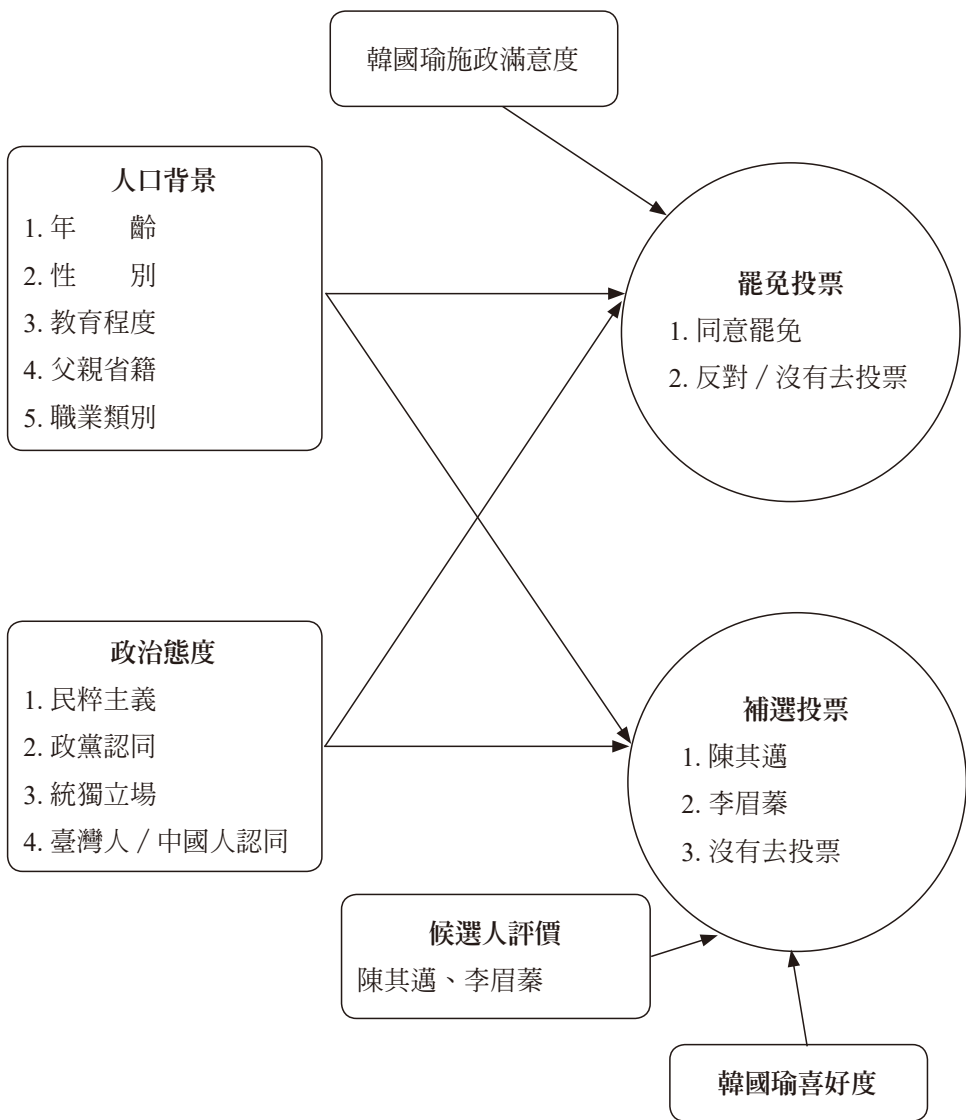


圖1 民粹主義與投票抉擇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1 高雄市選民的民粹分布

變數名稱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檢定
民粹主義						
罷免時期 ^a	859	0.00	1.00	0.51	0.20	0.64
補選時期 ^b	883	0.00	1.00	0.58	0.23	0.66

資料來源：^a蔡佳泓（2020）、^b陳陸輝（2020）。

說明：信度檢定為內在一致性的檢定（Cronbach's α 值）結果。

在了解高雄選民的民粹主義反菁英的態度情形後，表2與表3分別是我們針對兩次選舉中，民粹主義及韓國瑜施政滿意度、對韓國瑜評價的分析。

表2 民粹主義與韓國瑜施政表現（罷免）

變數名稱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民粹主義平均數
滿意韓國瑜施政	366	0	1	0.507
不滿意韓國瑜施政	423	0	1	0.517

資料來源：蔡佳泓（2020）。

表2我們列出了罷免時期，高雄市民對於韓國瑜市長的施政滿意度與民粹主義感受的情形，從表中可以看出對韓國瑜市長施政滿意的選民，民粹主義的表現平均數落在0.507，不滿意韓國瑜市長施政表現的選民，民粹主義的表現平均數是0.517，由此可以發現不滿意韓國瑜市長的選民，是具有較高民粹主義的傾向也說明了多數高雄選民的反菁英情緒是較高的，也說明韓國瑜市長雖然有韓粉的支持，但是多數選民對於他的認同已經從當時挑戰政治菁英的庶民，變成庶民不認同的政治菁英。

表3 民粹主義與韓國瑜評價（補選）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統計檢定結果
民粹主義	0.585	0.230	883	$r = 0.2745$
韓國瑜評價	3.642	3.037	1,088	$p < 0.001$

資料來源：陳陸輝（2020）。

表3我們進一步觀察補選時期對民粹主義及韓國瑜評價的情況，透過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兩者相關性為0.2745，並且具有較高的顯著性。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在補選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以及選民對韓國瑜個人的評價是相關的，雖然韓國瑜並非是補選時期參選人，但卻影響著選民對政治菁英的感受。

從表2與表3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韓國瑜市長過去的表現及以及個人形象都是影響著選民的民粹主義情緒，而選民的民粹主義感受也會進而影響他們的投票情形，所以對高雄市民來說，民粹主義在兩次選舉的影響都與韓國瑜有關。藉此我也進一步探討選民的民粹主義與其人口背景的關係。

表4是兩次調查中高雄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與人口背景的關係。我們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後發現，在罷免韓國瑜市長時期，影響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因素是選民的年齡與教育程度。

表4 民粹主義與人口背景關係

	罷免投票		補選投票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0）				
偏向統一	-0.061	(0.032)	-0.020	(0.033)
偏向獨立	0.005	(0.017)	-0.035*	(0.017)
政黨認同（中立=0）				
偏向泛藍	-0.033	(0.022)	0.034	(0.023)
偏向泛綠	-0.029	(0.017)	-0.080***	(0.019)
臺灣人／中國人認同（都是=0）				
偏臺灣人	-0.012	(0.019)	-0.077***	(0.019)
偏中國人	0.013	(0.044)	0.023	(0.047)
年齡（60歲以上=0）				
20-39歲	0.073**	(0.025)	-0.022	(0.026)
40-59歲	0.054*	(0.022)	0.012	(0.024)
性別（女性=0）				

	罷免投票		補選投票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男 性	0.025	(0.016)	0.003	(0.017)
教育程度（專科以上=0）				
國中以下	0.078**	(0.026)	-0.106***	(0.028)
高中職	0.039*	(0.018)	-0.014	(0.018)
父親省籍（大陸各省市人=0）				
本省客家人	-0.040	(0.035)	-0.039	(0.037)
本省閩南人	0.006	(0.024)	-0.029	(0.028)
職業類別（軍公教=0）				
職員	0.012	(0.025)	0.034	(0.025)
勞工	-0.007	(0.027)	0.037	(0.027)
農林漁牧	-0.044	(0.474)	0.098*	(0.050)
無正式工作收入	-0.009	(0.031)	0.026	(0.030)
常 數	0.468***	(0.038)	0.687***	(0.040)
統計資訊	R ² = 0.0413; N = 734		R ² = 0.1744; N = 778	

資料來源：蔡佳泓（2020）、陳陸輝（2020）。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在罷免投票時期，相較於60歲以上的選民，20-39歲的選民以及40-59歲的選民，民粹主義的傾向較高，意指對青壯年的選民而言，他們的反菁英的傾向比起年紀大的選民來說是比較高的；除此之外，相較於專科以上學歷的選民，高中職及國中以下的選民，也發現其民粹主義傾向偏高，代表韓國瑜市長已經不再是曾經的那位庶民代表，在學歷偏低的選民眼中，韓國瑜市長已經是腐敗菁英的角色，這與表2所傳達的訊息相似。在其他的人口變項上，並未發現會影響民粹主義傾向的因素，此結果與張佑宗（2009）在控制選民其他人口背景因素下，教育程度是影響選民的民粹式民主的結論極為接近，也說明了教育程度是會影響選民的民粹主義感受。

然而在補選時期，可以看出影響民粹主義的情形也較多，我們發現選民的統獨立場、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別等都會影響他們的民粹主義感受。首先，相較於統獨立場偏好維持現狀的選民，偏向獨立的選民，民粹主義的傾向較低，代表在補選時期，認同兩岸關係偏向獨立的選民，是比較認同他們所認定的政治菁英，所以在罷免韓國瑜之後，他們希望新上任市長在統獨立場上是偏向獨立的。

同樣的從政黨認同的情況來看，我們發現相較於政黨認同為中立的選民，政黨認同偏向泛綠的選民，民粹主義的傾向也較低，顯示了選民在補選時將民粹主義的感受投射在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希望新的市長是偏向泛綠出身的；同理可證在台灣人與中國認同上，相較於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選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選民，民粹主義的傾向也較低是相同的想法。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教育程度以及職業的影響。表4顯示學歷在國中以下的選民相對於專科以上學歷的選民，表現出的民粹主義感受較低，雖然高中職學歷的選民並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對比罷免時期的影響情況，選民的教育程度在兩個時期對民粹主義的影響是完全相反的。原因主要是罷免時期的選舉主題是以韓國瑜市長是否留任為主，而該時期選民已經沒有將韓國瑜市長視為庶民代表，而在補選時期，選民希望從這三位候選人選出一位可以代表庶民或是反菁英的市長，來改變韓國瑜市長所帶來的市政影響，所以補選時教育程度偏低的庶民階級，對民粹主義的影響會與在罷免時期的影響有完全不同的情況。

最後在職業的部份，農林漁牧為職業的選民，相對於軍公教職業背景的選民，民粹主義的傾向是偏高的。這也表示韓國瑜在位時期，確實得到農林漁牧背景選民的認可，因為韓國瑜市長曾有幫農民賣掉農作物的政績，以及農民人口較多的區如茂林、甲仙、桃源以及那瑪夏區是比較支持韓國瑜的情況，因此他們的民粹主義傾向較高是可以預期的。

前述我們說明了民粹主義在兩次投票時的傾向以及其與高雄選民人口背景及政治態度的關係，也充分了解了在兩個不同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感受有相當的不同，面對韓國瑜市長的罷免，以及補選的三位候選人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期待以及民粹主義感受的差異，這些都極有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投票選擇，以下我們將進一步分析民粹主義對罷免投票及補選的影響。高雄選民的罷免投票

分析如表5、表6。

表5 民粹主義與高雄市長罷免投票

	係數	標準誤	Exp(B)
民粹主義 (0-1)	-0.411	(0.695)	0.663
韓國瑜施政滿意度 (滿意=0)			
不滿意	4.633***	(0.515)	102.822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0)			
偏向統一	-0.798	(0.743)	0.450
偏向獨立	0.443	(0.281)	1.557
政黨認同 (中立=0)			
偏向泛藍	-0.812	(0.663)	0.444
偏向泛綠	1.114***	(0.277)	3.047
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 (都是=0)			
偏臺灣人	0.347	(0.376)	1.414
偏中國人	1.394	(1.101)	4.031
年齡 (60歲以上=0)			
20-39歲	-0.483	(0.448)	0.617
40-59歲	0.312	(0.429)	1.366
性別 (女性=0)			
男性	0.030	(0.276)	1.030
教育程度 (專科以上=0)			
國中以下	-0.171	(0.491)	0.843
高中職	-0.519	(0.325)	0.595
父親省籍 (大陸各省市人=0)			
本省客家人	1.423	(0.843)	4.148
本省閩南人	0.280	(0.655)	1.324

	係數	標準誤	Exp(B)
職業類別 (軍公教=0)			
職員	0.072	(0.487)	1.075
勞工	0.585	(0.529)	1.795
農林漁牧	0.427	(0.877)	1.533
無正式工作收入	-0.348	(0.561)	0.706
常數	-4.322***	(1.015)	0.013
統計資訊	$X^2 = 511.30***$; Pseudo $R^2 = 0.5667$; N = 662		

資料來源：蔡佳泓（2020）。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表5是高雄選民的罷免投票情形，由於前述我們發現罷免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與他們對於韓國瑜施政滿意度的感受是有關係的，所以在模型分析時，也同時進行了民粹主義與韓國瑜施政滿意度共線性(VIF)的檢定，我們發現兩變數共線性等於1，也說明兩者並非具有高度共線。

從表5的結果中，我們發現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不會影響他們對韓國瑜市長的罷免抉擇，真正影響選民投下贊成罷免票的是韓國瑜市長的施政表現以及選民的政黨認同。相較於對韓國瑜市長的施政表現感到滿意的選民，不滿意韓國瑜市長施政表現的選民會去投下同意罷免票，由此可知韓國瑜被罷免的結果主因，並非來自於高雄選民的反菁英感受，而是來自於韓國瑜當選市長以來的施政表現，高雄的選民在罷免時期，並沒有被民粹主義所影響。這樣的結果與我們先前的預期有所不同，我們預期選民會因為民粹主義的反菁英感受，把韓國瑜定位成腐敗的政治菁英，在對他產生不滿的情況下，進而罷免他的市長職位，但從結果來看，選民的確因為不滿意他的施政表現而罷免他，但不是因為民粹主義的反菁英感受而去罷免他。

除此之外，政黨認同與統獨立場的影響情形，與我們的預期相同。偏向泛綠認同的選民，與政黨認同偏向中立的選民相比，是會贊同罷免韓國瑜，因為韓國瑜代表的泛藍，如今罷免的提出是由泛綠所發起，所以在人民不滿施政表

現的情形下，不同的政黨認同選民，會傾向選擇罷免來改變現狀。統獨立場的部分，我們認為韓國瑜有幫助在地農民解決農產品外銷大陸的情形，並未在執政時期有較多的意識形態主張，也確實幫助農民解決了產品過剩的問題，因此統獨立場在此時並未影響去罷免他的意願。我們從表6在罷免投票時期，預測機率的邊際改變來看，我們發現在其他自變數都設定在平均值的情況下，對韓國瑜施政表現不滿意的選民，會比施政表現感到滿意的選民，投下同意罷免票的機率增加0.648；另外同樣的情況下，政黨認同為泛綠的選民，比起政黨認同中立的選民，投下同意罷免的機率增加了0.119，可以看出對選民投票影響較大的是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其次是選民的政黨認同。

表6 高雄市長罷免投票之預測機率的邊際改變

	邊際改變	標準誤
民粹主義 (0-1)	-0.038	(0.064)
韓國瑜施政滿意度 (滿意=0)		
不滿意	0.648***	(0.049)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0)		
偏向統一	-0.090	(0.091)
偏向獨立	0.041	(0.026)
政黨認同 (中立=0)		
偏向泛藍	-0.108	(0.091)
偏向泛綠	0.119***	(0.032)
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 (都是=0)		
偏臺灣人	0.034	(0.038)
偏中國人	0.113	(0.074)
年齡 (60歲以上=0)		
20-39歲	-0.046	(0.041)
40-59歲	0.025	(0.036)
性別 (女性=0)		

	邊際改變	標準誤
男 性	0.003	(0.025)
教育程度 (專科以上=0)		
國中以下	-0.015	(0.044)
高中職	-0.049	(0.031)
父親省籍 (大陸各省市人=0)		
本省客家人	0.115	(0.075)
本省閩南人	0.028	(0.067)
職業類別 (軍公教=0)		
職員	0.007	(0.047)
勞工	0.051	(0.049)
農林漁牧	0.038	(0.076)
無正式工作收入	-0.036	(0.056)

資料來源：蔡佳泓（2020）。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上述有關罷免案的研究結果，跟我們從理論上的預期結果些許不同，主要還是民粹主義並未在此時對選民產生投票抉擇的影響，而是由韓國瑜市長的施政滿意度決定了選民的投票抉擇，韓粉這個保護傘無法在此時真正幫韓國瑜保住市長大位。既然民粹主義無法影響高雄選民的罷免投票抉擇，那麼市長補選時期，韓國瑜幫忙李眉蓁站台，國民黨想要複製韓流的情形是否發生？我們將繼續分析高雄市長的補選情況，民粹主義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分析結果如表7、表8。

表7 高雄市長補選投票分析

自變數	陳其邁 / 沒有去投票		李眉秦 / 沒有去投票	
	係數	標準誤	Exp(B)	標準誤
民粹主義 (0-1)	-2.085**	(0.692)	0.124	(0.774)
陳其邁評價 (0-10)	0.778***	(0.098)	2.176	(0.072)
李眉秦評價 (0-10)	-0.096	(0.078)	0.909	(0.098)
韓國瑜評價 (0-10)	-0.259**	(0.075)	0.772	(0.082)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0)				
偏向統一	0.307	(0.673)	1.360	(0.553)
偏向獨立	0.173	(0.284)	1.189	(0.514)
政黨認同 (中立=0)				
偏向泛藍	0.154	(0.530)	1.166	(0.449)
偏向泛綠	1.207***	(0.315)	3.345	(0.555)
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 (都是=0)				
偏臺灣人	-0.244	(0.338)	0.784	(0.387)
偏中國人	-0.538	(1.138)	0.584	(0.656)
年齡 (60歲以上=0)				
20-39歲	-0.975	(0.497)	0.377	(0.563)
40-59歲	-0.683	(0.460)	0.505	(0.473)
60-69歲	-0.504	(0.460)	0.505	(0.473)
70歲以上	-0.307	(0.460)	0.505	(0.473)

自變數	陳其邁 / 沒有去投票		李眉秦 / 沒有去投票	
	係數	標準誤	Exp(B)	標準誤
性別 (女性=0)				
男 性	-0.216	(0.278)	0.806	(0.373)
係數			1.016**	
Exp(B)				2.762
教育程度 (專科以上=0)				
國中以下	0.313	(0.514)	1.368	(0.668)
高中職	0.310	(0.308)	1.363	(0.374)
父親省籍 (大陸各省市=0)				
本省客家人	1.210	(0.745)	3.352	(0.691)
本省閩南人	1.278*	(0.599)	3.589	(0.447)
係數			-0.047	
Exp(B)				0.954
標準誤				(0.447)
職業類別 (軍公教=0)				
職員	0.022	(0.434)	1.022	(0.503)
勞工	0.230	(0.478)	1.259	(0.578)
農林漁牧	-2.210**	(0.770)	0.110	(1.480)
無正式工作收入	-0.528	(0.521)	0.590	(0.595)
常 數	-3.956**	(1.155)	0.019	(1.013)
統計資訊	$X^2 = 611.168^{***}$; Pseudo $R^2 = 0.4782$; N = 651			

資料來源：陳陸輝 (2020)。

說明：1. 本模型已經通過IIA不相關選項獨立性檢定(hausman)，依變數選項彼此互相關立。

2.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表7是高雄市長補選投票情形，由於分析模型是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我們也執行了模型假設的不相關選項獨立性檢定(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所有的卡方值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表示該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並不違反假定。研究發現在補選高雄市長時，民粹主義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相對於沒有去投票的選民，民粹主義傾向較低的選民會去投給陳其邁，但是相對於沒有去投票的選民，投票給李眉蓁的選民不會受到民粹主義傾向的影響。

前述我們有發現，當選民提出要罷免韓國瑜市長的時候，韓國瑜就從之前的庶民代表，變成腐敗的菁英階級，比起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他們更重視的韓國瑜的施政表現。到了補選時期，選民期待的是重新尋找一位新的庶民代表，無疑的就是希望不要再有韓國瑜市長的情況出現，國民黨希望複製韓流現象，在選前最後的造勢再把韓國瑜請出來，但是多數高雄市民此時已經沒有認同現在的韓國瑜，所以補選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會展現在投票給陳其邁的選擇上，選民認為陳其邁雖然沒有太多的庶民語言及煽動的言論，但卻是一位可以逆轉韓國瑜治理高雄情形的好選擇。

特別的部分是民粹主義傾向偏低的選民，會投票給陳其邁，這與民粹主義的理論是不同的。過去的理论指出選民為了對抗腐敗的菁英，因此擁護庶民代表，使其成為民粹主義者，代表人民對抗菁英，所以理論上選民應該會有較高的反菁英感受來選出庶民代表。然而，表7告訴我們的是民粹主義愈低，才讓挑戰者上位，兩個情況是完全相反的，造成這樣的情形的主因是，高雄市長此次的選舉是先罷免後補選。一般情況下是會讓庶民代表直接挑戰政治菁英，但是先罷免後補選的結果，就會在補選時期，看選民認同哪一位政治菁英，希望他可以當選，所以變成選舉的時候，沒有在位的腐敗菁英了，選民要的是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政治菁英，所以才會變成造成民粹主義偏低的選民會投票給陳其邁，因為此時的多數選民，是認同陳其邁這位民進黨的政治菁英，成為高雄市長。

除了民粹主義以外，我們也看到選民對候選人的喜好程度也是影響投票的因素，如預期一樣，喜歡陳其邁的人會去投給他，喜歡李眉蓁的也會去投給她，但特別的是不喜歡韓國瑜的選民會把票投給陳其邁，而喜歡韓國瑜的選民

卻沒有把票投給李眉秦，也代表韓國瑜在最後想動員韓粉支持李眉秦的效果是不足的，也說明了韓粉不僅是死忠支持，也是無法轉移支持對象的。另外在投票給陳其邁的選民中，也包括政黨認同偏向泛綠、省籍偏向本省閩南人者，而職業是農林漁牧的選民是不會投給陳其邁，這與前述我們分析補選時選民的民粹主義與人口背景的結論一樣，除了韓國瑜有幫農民推銷農產品外，也表示該職業的選民對於陳其邁是不認同的。

在投票給李眉秦的選民中，除了候選人喜好程度外，政黨認同、年齡以及性別是主要投票給他的原因。政黨認同偏向泛藍的選民會投票給他，因為她是國民黨推派的候選人，泛藍的支持者會支持她；另外20-39歲的選民相較於60歲以上的選民是不會投票給李眉秦，指出李眉秦沒有得到年輕人的認同，但是她卻吸引到男性選民投票給她。

表8 高雄市長補選投票之預測機率的邊際改變

自變數	投給陳其邁		投給李眉秦	
	邊際改變	標準誤	邊際改變	標準誤
民粹主義 (0-1)	-0.203**	(0.067)	-0.030	(0.048)
陳其邁評價 (0-10)	0.079***	(0.008)	-0.022***	(0.004)
李眉秦評價 (0-10)	-0.011	(0.006)	0.018**	(0.006)
韓國瑜評價 (0-10)	-0.027***	(0.007)	0.012*	(0.005)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0)				
偏向統一	0.030	(0.067)	-0.001	(0.034)
偏向獨立	0.016	(0.029)	0.016	(0.034)
政黨認同 (中立=0)				
偏向泛藍	0.006	(0.057)	0.090**	(0.031)
偏向泛綠	0.135***	(0.036)	0.003	(0.029)
臺灣人 / 中國人認同 (都是=0)				
偏臺灣人	-0.022	(0.032)	-0.015	(0.024)
偏中國人	-0.059	(0.110)	0.057	(0.054)

自變數	投給陳其邁		投給李眉秦	
	邊際改變	標準誤	邊際改變	標準誤
年齡（60歲以上=0）				
20-39歲	-0.089	(0.048)	-0.065	(0.035)
40-59歲	-0.055	(0.044)	-0.001	(0.033)
性別（女性=0）				
男性	-0.028	(0.028)	0.065**	(0.022)
教育程度（專科以上=0）				
國中以下	0.027	(0.051)	0.029	(0.049)
高中職	0.034	(0.031)	-0.029	(0.023)
父親省籍（大陸各省市=0）				
本省客家人	0.122	(0.074)	-0.009	(0.043)
本省閩南人	0.128*	(0.059)	0.002	(0.029)
職業類別（軍公教=0）				
職員	0.003	(0.043)	-0.011	(0.033)
勞工	0.024	(0.047)	-0.016	(0.037)
農林漁牧	-0.210**	(0.069)	-0.045	(0.078)
無正式工作收入	-0.053	(0.051)	0.007	(0.040)

資料來源：陳陸輝（2020）。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雙尾檢定）。

我們也從表8的預測機率的邊際改變來看，在其他變數維持平均數時，選民的民粹主義最低者，比起民粹主義最高的時候，會投票給陳其邁的機率減少0.203，所以選擇投票給陳其邁的民眾，是對於反菁英感受較低的選民；其次在一般的情況下，對陳其邁的評價愈高，投票給他的機率會增加0.079，對韓國瑜的評價愈高，投票給陳其邁的機率會減少0.027；另外在政黨認同部分，相較於政黨認同中立的選民，政黨認同偏向泛綠的選民會比偏向中立的選民，投票給陳其邁的機率增加0.135；相較於父親省籍是大陸各省市人的選民，

父親省籍為閩南人的選民比大陸各省市人的選民，投票給陳其邁的機率增加0.128；最後，職業是農林漁牧相較於軍公教的選民，投票給陳其邁的機率會減少0.21，可以看出影響選民投票給陳其邁，影響最大的是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其次才是選民的政黨認同。

在李眉秦的投票影響中，在一般的情況下，對陳其邁評價愈高，投票給她的機率會減少0.022，但對她自己的評價愈高時，投票給她的機率會增加0.018；並且相對政黨認同偏向中立的選民，泛藍選民投票給李眉秦的機率比中立選民增加了0.09；男性相較於女性投票給她的機率增加了0.065。較為特別的是選民對韓國瑜評價愈高時，投票給她的機率增加了0.012，這與我們在表7的模型中，並未發現韓國瑜的喜好程度會影響選民的補選投票抉擇有所差異，這也指出了個別討論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時，韓國瑜的喜好程度是會影響選民投票給李眉秦，但是納入其他因素控制後，投票給李眉秦的主因不會是選民對韓國瑜的喜好程度。所以我們回到表7的分析，可以發現韓國瑜站台算是有效，但不足以幫助李眉秦當選，所以綜觀投票給李眉秦的選民，主要是靠政黨認同，其次是男性選民，以及年輕人的支持。

伍、結論

民粹主義雖然在定義上有多元的解釋，大部分學者還是聚焦於人民與政治菁英的關係，也就是民衆反菁英的情緒。當人民的民粹主義愈高時，代表菁英的作為已經脫離人民的感受，造就了需要改變現狀的氛圍；反之，人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愈低時，就不會有想要對抗政治菁英或改變體制的作為。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選民的民粹主義產生，除了來自於反對政治菁英的態度外，也會從個人的意識形態及人口背景表現出來。西方的研究中，左翼與右翼的意識型態會激發選民的民粹主義，進而影響他們的投票及其支持的政黨；然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選民的民粹主義是建立在威權轉型過程的社會氛圍，基礎上與西方民主化的過程相似，都是為了反對政治菁英的腐敗而產生的現象，不過相較於西方的研究，台灣民粹主義的研究甚少。然而，我們也從

不同時期的研究發現，台灣的民粹主義是持續的發展，它可能是來自於選舉的操作，也可能是因為不同原因讓不同背景的選民感受自己跟政治菁英不和諧，並且發起反對政治菁英的活動。

本文回顧了台灣民粹主義的發展，結合西方國家對於民粹主義的定義，來解釋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的情形。韓國瑜以及韓粉的出現，從高雄席捲至全台灣，對於選出韓國瑜作為市長的高雄選民而言，他們是最直接看著這個現象大起大落，所以當韓國瑜沒有選上總統的時候，高雄市民當時對韓國瑜的態度是否還保留著當時的民粹主義心態，並且是否延伸至後來的罷免及補選。

我們從研究發現，韓國瑜在經歷過以庶民身分，成功挑戰了高雄市長職位，但想要複製一樣的經驗挑戰總統大位失利之後，對於高雄市民的感受是他已經不再是當時競選高雄市長時的庶民代表，韓國瑜市長的身分從庶民變成腐敗的政治菁英，所以高雄市民對他的不滿是可以預期的，但是也發現真正讓市民罷免他的原因並非是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而是韓國瑜市長的施政表現。這也代表韓國瑜及韓粉的現象，在韓國瑜挑戰總統大選失利之後，就已經逐漸淡化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選民對市長職位的期待。

在補選時期，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影響了他們投票給陳其邁的意願，但沒有影響他們投票給李眉蓁。特別要說明的是，民粹主義傾向較低的選民會投票給陳其邁，與過去文獻的預期有所不同，原因在於高雄市先罷免後補選的選舉模式，導致選民在補選的時候，候選人沒有可以挑戰在位的政治菁英，選民是直接選擇政治菁英進到市長大位，所以產生了選民反菁英情緒偏低，但依然影響他們的投票抉擇，這也是本文與其它台灣及西方研究不同的研究發現。當民選職位已經先有罷免成功之後，補選投票時的選民，他們民粹主義的表現會與沒有先經過罷免成功程序的表現，呈現相反的情況，這也是本文相當重要的發現。

參考文獻

I.中文部分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55。

(Wang, Jenn-hwan, and Y. S. Chien. 1995. "Mai siang sin guo jia? Min cuei wei cyuan jhu yi de sing cheng yu min jhu wun ti" [March towards a New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20: 17-55.)

法務部，202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5日。

(Ministry of Justice. 2021. "Gong zhi ren yuan xuan ju ba mian fa" [Civil Servants Election and Recall Act]. Laws & Regulations Datab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 [accessed October 25, 2022].)

何振盛，2020，〈民粹思維與「韓流」現象〉，《發展與前瞻學報》，27: 93-111。

(Ho, Jeng-sheng. 2020. "Min cuei sih wei yu han liou sian siang" [Populism and the "Han Wave" Phenomen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27: 93-111.)

胡正光、江素慧，2020，〈民粹主義在台灣-韓國瑜及其支持者〉，《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6(3): 155-183。

(Hu, Cheng-kuang, and Su-hui Chiang. 2020. "Min cuei jhu yi zai tai wan han guo yu ji ci jhih chih jhe" [Populism in Taiwan: Han Kuo-yu and His Supporter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6(3): 155-183.)

張佑宗，2009，〈搜尋台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5: 85-113。

(Chang, Yu-tzung. 2009. "Sou syun tai wan min cuei shih min jhu de cyun jhong ji

chu” [The Mass Bases of Populist Democracy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5: 85-113.)

陳陸輝，2020，〈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1/4)：高雄市長補選電訪案〉，計畫編號：MOST109-2740-H-004-004-SS4，台北：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Chen, Lu-huei. 2020. “*Tai wan xuan ju yu min zhu hua diao cha(1/4): Gao xiong shi chang bu xuan dian fang a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20-2024(I):Kaohsiung City Mayor By-Elections: Telephone Interview]. MOST109-2740-H-004-004-SS4.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黃昱琄，2014，〈台灣民粹主義轉變的探討：選舉民粹主義的形成〉，《弘光人文社會學報》，17: 52-73。

(Huang, Yu-ting. 2014. “tai wan min cui jhu yi jhuan bian de tan tao : syuan jyu min cui jhu yi de sing cheng” [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Populism: The Formation of Populist Electoralism].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7: 52-73.)

蔡佳泓，2020，〈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Tsai, Chia-hung. 2020. “*Gao xiong shi di san jie shi zhang ba mian an tou piao yan jiu*” [A Voting Study of Kaohsiung City's third Mayor's Recall].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lection Study Center.)

II. 外文部分

Akkerman, Agnes, Cas Mudde, and Andrej Zaslove. 2014. “How Populist are the People?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in Vot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9): 1324-1353.

Akkerman, Agnes, Andrej Zaslove, and Bram Spruyt. 2017. “We the People or We the Peoples’ A Comparison of Support for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nd Pop-

- ulist Radical Left in the Netherland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4): 377-703.
- Axelrod, Robert. 1967.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Issue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1(1): 51-60.
- Bakker, Bert N., Matthijs Rooduijn, and Gijs Schumacher. 2016.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Populist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therlands and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5(2): 302-320.
- Batto, Nathan F. 2021. “The Impact of Han Kuo-yu’s Populist Rhetoric in the 2018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8(2): 47-94.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novan, Margaret. 1984. “‘People’, Politician and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9(3): 312-327.
- Hawkins, Kirk, Scott Riding, and Cas Mudde. 2012.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Political Concepts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Methods Working Paper Series* 55: 1-35.
- Ionescu, Ghita, and Ernest Gellner. 1969.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Co.
- Leininger, Arndt, and Maurits J Meijers. 2021. “Do Populist Parties Increase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Over 40 Years of Electoral History in 31 European Democracies.” *Political Studies* 69(3): 665-685.
- Mudde, Ca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Jan-Werner. 2016.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Norris, Pippa, and Ronaldo Inglehart. 2019.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wakowski, Adam. 2021. “Do Unhappy Citizens Vote for Popu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1-28.

- Oliver, J. Eric, and Wendy M. Rahn. 2016. "Rise of the Trumpenvolk: Populism in the 2016 Ele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7(1): 189-206.
- Schulz, Anne, Philipp Müller, Christian Schemer, Dominique Stefanie Wirz, Martin Wettstein, and Werner Wirth. 2018.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on Three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30(2): 316-326.
- Taggart, Paul A.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van Leeuwen, Eveline S., and Solmaria Halleck Vega. 2021. "Voting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Spatial Perspectives and Applications Across Europe."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 13(2): 207-435.

附錄

附錄資訊可於當期期刊出刊後，於《選舉研究》期刊網頁查詢。¹

附錄一：問卷題目與重新編碼。

附錄二：描述性統計。

附錄三：民粹主義問卷測量語句。

¹ 選舉研究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jestw.com/tc/index.php>。

Populism and the 2020 Mayoral Recall and By-election of Kaohsiung City

Tsung-han Liao^{*}

Abstract

Populism is deeply embedde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a thin ideology composed of many different concepts affects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ir vote choices. Based on voters' populist incli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oting in the recall of the mayor and the by-election of Kaohsiung City in 2020. In the two different voting periods, the voters' populist inclination was affected by their demographic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is study uses two sets of data to analyze the voting for the recall and the by-election. One is "A Voting Study of Kaohsiung City's Third Mayoral Recall" hosted by Tsai Chia-hung and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the other is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20-2024(I): Kaohsiung City Mayor By-Elections: Telephone Interview hosted by Chen Luhui"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Election Study Center. We found that during the recall period, populism was affected by the age and education of the voters. During the by-election period, the populist inclination was affected by voters' party identity,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In addition, the populist inclination of Kaohsiung voters did not affect their decision to vote for recall.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Han Guo-yu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voters to vote for the recall and in the by-election, voters with lower populist inclination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voted for Chen Chi-mai, but it did not influence voters to vote for Li Mei-jhen. Although Han Guo-yu helped Li Mei-jhen in the campaign, it did not affect the voters' choice.

Keywords: populism, recall, by-election, Han wave

